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4.06.019

■ 历史研究

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成因探析^①

李端祥,肖楚楚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是“大跃进”的产物,此论断有一定的道理,但仅从实践的层面上阐述了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社会根源。实质上,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思想根源则是关键,是主因。

关键词:城市公社;公共食堂;成因;探析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4)06-0102-05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Public Canteens of City People's Communes

LI Duan-xiang & XIAO Chu-chu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public canteens of the city people's communes resulted from the "Big Leap". It justifies the conclusion, to some extent. However, it only elaborates the social roots that emerges the public canteens of the city people's communes from the practical perspective. Essentially, there are complex reasons for it. Apart from the practical side, theoretical, ideological and social roots have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among which the ideological root is the major cause. In other words, external cause makes up the ground of change, while internal cause makes up the condition.

Key words: city people's communes; public canteens; reasons; analysis

公共食堂是城市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城市人民公社时期的一个重要事物,它不仅是持续“大跃进”中“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1]41},更是新中国的缔造者们建成社会主义并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桥梁”与“标本”。人们对于农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耳熟能详,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如千骑逐鹿。但对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研究却几乎无人问津。有关资料的缺乏很可能是造成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在收集、整理城市人民公社文献时,涉猎了大量的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文献资料。基于此,本文仅就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原因进行初步探讨。

一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是公共食堂产生的理论根源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共产党宣言》深刻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年2月,恩格斯在爱北裴特的演说对“共产主义”或“公社”作了更详细、更具体、更具诱惑的论述。“大跃进”运动

① 收稿日期:2014-05-2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2ADJ001)

作者简介:李端祥(1962-),男,湖南湘乡人,硕士,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与研究。

期间,宣传、报导、鼓吹人民公社优越性的理论根据基本出自这篇经典文献。对于公共食堂,恩格斯指出:“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佣厨子,单独在市场上,在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许许多多地方,浪费了不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假设,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一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的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的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2]613}显而易见,恩格斯对公共食堂是十分赞赏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品私有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甚至是社会的危机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诸多不合理、不科学之处:食品浪费和地方的被白白占据以及劳动力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应有的效率。而要消除这些弊端,建立公共食堂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也因之是所有共产主义信仰者所要追求的目标。列宁是把共产主义在一个国家内全面实践的第一人,他把公共食堂定性为共产主义的“幼芽”“标本”。他说:“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3]19}列宁所说的“幼芽”,是指公共食堂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中破土而出,它既能成为参天大树,当然也可能夭折;他所说的“标本”,指公共食堂是共产主义或公社的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述,更确切点说,公共食堂等于共产主义或公社,共产主义或公社必需有公共食堂,没有公共食堂就不叫做共产主义或公社。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各种巨大革命运动的胜利确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绝对威望。长期受苦的人民大众更是顶礼膜拜,坚信不疑。所以,恩格斯、列宁关于公共食堂的深刻阐述,就成了当时城市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的理论依据。

二 毛泽东关于办公共食堂的设想与刘少奇的宣扬是其产生的思想根源

毛泽东办公共食堂的设想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前夕提出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时,毛泽东同他们谈了公社与我国未来社会情景的设想。据陆定一回忆:“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4]732-733}

毛泽东的上述设想,刘少奇在第一时间把它透露给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并授意他在河南试验一下。1958年11月,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刘少奇回忆说:“公社这个名词,我记得,在这里,跟吴芝圃同志谈过。在广州开会……下了火车,在这个地方,大概有十几分钟,跟吴芝圃同志说,我们有这样一个想法,你们可以试验一下。他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吴芝圃插话:那个时候,托儿所也有了,食堂也有了,大社也有了,还不叫公社),工农商学兵都有了,就是不叫公社。”^{[4]732}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期间,上述设想经过一些人的引用而传播开来。毛泽东对此表示默许。会后,刘少奇在公开场合多次宣扬毛泽东办公共食堂的想法。1958年6月14日,刘少奇与全国妇联党组谈话,提出了家务劳动社会化的意见,要求在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和敬老院。这是我们看到的刘少奇乃至中共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最早谈话。30日,刘少奇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提出三四十年即可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就要开始试验^{[4]734}。

1958年9月16日至18日,刘少奇在河南郑州、开封两市视察了人民公社和钢铁生产的情况,并听取了河南省委、郑州市委等市、州关于人民公社建立和发展情况的汇报,听取了省直属机关党委关于省直机关的人民公社情况的汇报。之后,刘少奇作了重要指示,具体阐述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其中第二条就是:“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参加生产。”^[5]吴芝圃根据刘少奇的有关指示,把河南省办成了人民公社与公共食堂的试验场与策源地。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视察冀、鲁、豫三省人民公社的消息在《人民日报》登载后,河南省委下达指示:“在城市也要举办人民公社。”中共郑州市委“立即研究,全面号召”^[6]。管城区清真寺街的党组织和居民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贯彻省、市委的指示精神,1958年8月15日在郑州市管城区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城市人民公

社——红旗人民公社。这个社有9 213人,1 828户,其中汉民773户,回民1 055户。全社共办公共食堂28个,有1 329户,4 593人参加^[7]。1958年9月中旬,郑州市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全市共建立公共食堂(包括工厂、企业、机关、学校等单位的职工食堂)1 337个,在食堂吃饭的431 606人,占全市总人数的83.5%;未在食堂吃饭的85 745人,占16.5%;其中食堂的管理和炊事人员10 676人,平均每个炊事员负担41人的炊事工作^[8]。

当公共食堂办起来之后,毛泽东对它倍加呵护,高度赞扬。1958年8月17日至3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间,多次论及公共食堂。他说:“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8]“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4]742}

1958年11月28日到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12月7日,毛泽东为印发《张鲁传》写了批语:“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9]627-628}闭幕的前一天,12月9日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谈到公共食堂时说:“关于两种可能性。公共食堂、托儿所、人民公社,看来是会巩固,但是要料到有些东西要垮掉。巩固和垮台,这两个可能性都存在。总的说来,垮掉是部分的和暂时的,它的总趋势是要站立起来,发展起来。党也有这两种可能。现在,我们就要注意到可能发生的那种不利于巩固的大规模的分裂。你如果不想到,不准备着,就会发生;你准备着,就可能避免。关于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我看还是两个可能,或者胜利下去,或者灭亡。”^{[10]552}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公共食堂等的巩固和垮台,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存亡命运攸关的大事。

三 适应“大跃进”的需要是公共食堂建立和发展的实践根源

公共食堂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分配方式。它的建立和发展不能不受“大跃进”的制约与影响。在中国城市里,公共食堂有较久远的历史渊源。解放前公共食堂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是在国民党统治下工厂里的工人食堂,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和城市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有本质区别,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9]573}。由于城市生产和劳动社会化、集体化程度高,这种食堂早就存在于城市的许多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里,公共食堂是和这些单位的劳动者劳动的社会化、集体化相联系的。而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前身——街道居民办的公共食堂,却是“大跃进”运动开始后发展起来的。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开始了1958年的生产“大跃进”,城市工业得到迅速发展,民办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街道居民的就业率普遍提高,成批地参加集体的社会劳动。为解决集体生产和分散做饭的矛盾,要求建立公共食堂,于是在1958年,第一批街道公共食堂就诞生了。

集体生产和分散做饭的矛盾,实际上反映了作为生产关系的一个方面的消费方式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就是生产关系的矛盾。1958年建立的一批公共食堂,在解决妇女劳动力和保证生产“大跃进”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使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但上述矛盾并未根本解决。

经过1958、1959年连续两年的“大跃进”,特别是1960年为了继续保持“大跃进”的速度,要求城市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这在当时由于农村生产力极其落后因而不可能大量抽调劳动力来支援城市的条件下,除了依靠大搞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运动外,还要充分动员一切可能利用的城市劳动资源。但另一方面城市却还大量存在着闲散劳动人口,而这些人,大都是从事做饭、带小孩等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这显然与城市工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相矛盾。例如银川市居安巷共有居民1 013户,14 900多人。随着公社化和生产建设的飞跃发展男劳动力已充分就业,女劳动力73%参加了生产,出现了“家家无闲人,人人有事做”的新气象^[11]。但一部分职工家属由于家务拖累,未能入社参加生产;已参加生产的,仍有不少人家务负担过重。这些都和持续“大跃进”的要求相矛盾。

1960年4月掀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高潮,开展了以组织生产为中心的全面组织人民经济生活的运动。为了生产加番的需要,民办工业全面开花,发展很快。例如杭州市有民办工厂496个,参加生产的有15000人,分散在社会上还未参加生产的整、半劳动力有15000~20000人左右,温州市有民办工厂179个,居民生产加工厂117个,参加生产的有17000人,分散在社会上还没参加生产的整半劳动力有10000人左右^[12]。就是说,除去在机关、团体、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以外,这两个市的居民中,可以组织起来的闲散劳动力有半数左右已经组织到民办工厂里来,还有半数左右需要继续组织起来。原有城市闲散居民,一方面由于参加某种生产,有集体做饭的需要,同时由于他们有收入了,她们也愿意参加食堂。这就必然要求公共食堂相应地有大量而普遍的发展。

由此可见,公共食堂的普遍发展,是生产上持续“大跃进”的客观要求,也是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使然。

四 城市居民对公共食堂的热烈向往与盲目追随是其产生的社会根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通过不同途径和形式对城市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信念教育,使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了初步的了解,朦胧地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限美好的社会。从而激起城市底层民众渴望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过上美好生活的强烈憧憬。正当城市居民沉浸在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中时,农村人民公社和中共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前景的美好判断,通过各种渠道传给了城市居民。比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各取所需”、“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和将来的事情了”^{[13]388}等,使他们感觉到,过上共产主义的美好生活不再是梦想了,并相信这一天即将到来。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各系统的党组织和街道居民群众对公社与公共食堂的建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并付诸行动。党组织进行大力宣传,大谈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与公共食堂的好处,居民群众中许多人对此深信不疑,他们写申请、表决心,纷纷要求组建人民公社,参加公共食堂。例如兰州市财贸系统职工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认识明确、热烈拥护,行动积极者7556名,占职工总数72.06%,其中党员1317名,占党员总数87%;团员808名,占团员总数80.0%;群众5431名,占群众总数68.2%。如百货公司针织商店总务员胡福贤(党员)听了动员后立即写了入社申请书要求参加城市人民公社,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并动员爱人参加了工作,还积极主动帮助五泉山街道办事处大办食堂。肉联厂党员陈璧在动员以后正巧爱人有病,但他毫不犹豫将粮食转入食堂,并动员爱人参加保育员工作。农副公司木器加工厂邵梅影(党员)、王莎莉(团员)两同志听了报告后就积极动员组织职工家属参加食堂和工作,在一天内使该厂101名职工和家属(除一名外)全部参加了食堂吃饭。同时又积极组织起了托儿所、洗衣组、缝纫组,解决了家属工作问题。市人民银行干部牟本仁(群众)主动帮助街道居民食堂算账,并动员母亲带头到食堂作饭。市粮食局工人彭正明说:“成立食堂真正好,三买(买粮、买菜、买煤)一不(孩子牵累不能安心工作)减去了。”工人周作仁说:“参加食堂好处多,节约劳力花钱少,孩子送进托儿所,从小思想教育好,大人高兴小孩欢,干劲倍增搞生产。”^[14]又如天津市天纬路街的居民都说组织城市人民公社是“毛主席的好主意”,是“一条幸福的道路”。最先组织起来的鸿顺里居民第一批报名入社,“他们等不及社里发下来申请书,在一张白纸上,全胡同每一个人都写上了自己的名字。”^[15]其中,广大妇女对办公共食堂的热情与积极性特别高,她们相信,有了公共食堂,就可以从繁琐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且能走上集体生产和独立生活的岗位,为“大跃进”出更多的力。因此,她们热情地歌颂道:“街道办食堂,省钱又省粮,人人吃得好,个个喜洋洋,生产增干劲,感谢共产党。”^[16]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就是在这种组织上大力鼓动与群众积极参与的热烈场景中诞生的,而无暇考虑雄厚的物资基础与人们生活的真正需要以及广大参与者各方面的素质等诸多因素。

正是在上述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在全国大办城市人民公社的同时出现了大办公共食堂的高潮。据1960年3月末统计,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已建立598个城市人民公社。“公社和街道举办了食堂五万零三百一十一个,占上述城市〔1959年底,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共有设市制的城市184个。

上述城市是指其中的164个(另20个城市是新疆和云南的,未在统计之内)——作者注]全部食堂(不包括商业部门的营业食堂)总数十三万一千二百三十四个的百分之三十八点三,就餐人数五百二十二万,占城市全部食堂就餐人数二千三百五十六点六万的百分之二十二点一五,占城市人口的百分之七点八。例如重庆、哈尔滨、天津、郑州、石家庄等城市参加食堂人数(包括机关、学校、企业食堂)已占市区人口的50%左右。”^[17]

又据全国总工会调查统计,截至1960年7月底止,在190个大中城市里,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已达76000多个,入伙人数1700多万人,加上国营企业、机关、学校办的食堂,共达17万多个,入伙人数4300多万人,占上述城市人口的60%^[18]。

综上所述,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理论根源、思想根源、实践根源和社会根源。其中思想根源是内因,其余三项均系外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意志与喜好是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决定因素。当然,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探析城市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产生的历史原因,并不是为了批评或贬低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而是以史为鉴,吸取教训。生产关系的改变必须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全体社会成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改变,不能以领袖个人的意志与喜好来决定,否则,将遭到历史的惩罚^[19]。

参考文献:

- [1]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 [5] 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N].人民日报,1958-09-24.
- [6] 郑州市城市人民公社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Z].郑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14-1084.
- [7] 郑州市人民公社基本情况[Z].郑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14-1085).
- [8] 逢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11] 区、市组织人民经济生活工作组工作情况报告[Z].银川市档案馆馆藏档案,1960年,长期,340号卷.
- [12] 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化后民政工作变化情况的调查报告[Z].浙江省档案馆馆藏档案,J103-12-17.
- [1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4] 关于市级财贸系统职工对成立城市人民公社中的思想反映[Z].兰州市档案馆馆藏档案,001-1-19600128.
- [15] 鸿顺里展示城市人民公社无限美景[N].天津日报,1960-04-08.
- [16] 河北省委小城镇人民公社工作会议纪要[Z].河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855-5-1977.
- [17] 中央转发全总党组“有关城市人民公社的概况”的报告[Z].湘潭市第二档案馆馆藏档案,2-1-27.
- [18] 中央批转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整顿和巩固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报告[Z].中央档案馆馆藏档案(中央传阅文件),6/1076.
- [19] 高其荣.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对人民公社体制的调整[J].毛泽东研究,2014(1):28-38.

(责任校对 莫秀珍)